责编：沈辉 E-mail：zydxshenhui@2008.sina.com Tel:010-62806418

◆观 点

去除“犯罪化标签”是法治进步

近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在该省法院刑事审判工作会上表示，今后要改变旧有法庭设置，以去除对被告人“犯罪化标签”：刑事案庭审时不能让被告人坐铁笼子，不再剃光头、穿囚服。被告应穿便装和辩护律师坐一起，和控方“对抗”。

1996 年 3 月第一次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12 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亦即说，从那时起，即便成为被告人，只要没有经过严格的司法审判程序，都应依法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包括各种人格与人身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坐铁笼子、剃光头、穿囚服，这些施诸普通公民身上理所当然被视为侵权与违法的限制措施，加于被告身上也理所当然地是侵权与违法，并无他异。

但是，在司法与审判实践中，这种种带有人身限制和羞辱的“习惯性动作”不仅屡见不鲜，甚至成为常规。不同寻常的，倒是能够如常人一样便装出庭；再能够和辩护律师冠冕堂皇地坐在一起，与控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地“对抗”，除非奢望，就是特权了。

由此而言，被告人去“犯罪标签化”的要求，就至少具有两层意义：一是保障被告人的基本公民权利与人格尊严；二是恢复司法与审判过程中的程序正义，重塑公信，维护法律自身的权威、尊严。

此外，严格来说，坐铁笼子、剃光头、穿囚服，并非仅具形式上的犯罪标签意义，也能称得上是具有实质意义的惩罚。且不说坐铁笼、穿囚服具有明显的人格侮辱意味，就说剃光头，仿佛如理发般地没有肉体痛苦，甚至有监管机构会借口卫生与管理的需要，说成是被告人“自愿”而为，但究其实际，对被告人产生的人格贬损与心理压力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早在我国上古时期，就有剃掉全部头发或部分头发的髡刑作为耻辱刑流行，所以，剃发所带来的羞辱，即便是对于中小学生也会产生要跳楼的后果。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法外惩罚，不仅有违“罪名法定、罪刑相当”的司法原则，也会对社会传统伦理产生一定冲击。

因此，贴了“犯罪化标签”的罪犯，相当于未经审判就先受到身心惩罚，而在接下来的庭审中，与控方还未抗辩，就自然会先失去气势。如此庭审，难言公平公正，相应就难以保证审判质量，最终流失的还是司法公信。在这一层面上，为被告人去除“犯罪化标签”，实际上也是为司法、审判贴上一道“质量检验合格证”。

而回到问题本原，被告人“犯罪化标签”的粘贴本身就不具备合法正当性，但在执法乃至审判过程中却被熟视无睹，这种执法犯法的状况，根本原因还在于对公民的权利没有足够尊重，权力自我扩张而失范。

所以，河南省高院改变旧有法庭设置的安排，具有某种象征意义：重新摆正权力与权利的位置。权力和权利不失衡，才会抵达法平如水的法治境界。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应该也是这个意思。（2013 年 12 月 4 日《三湘都市报》赵强）

有更多公平机会“国考热”才会降温

国家公务员考试再次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据报道，这次考试共 111.9 万人参加，平均录用比 57:1，竞争依然激烈。在公务员考试走热的同时，社会舆论对大学毕业生蜂拥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批评、指责也越来越多。

舆论如果将矛头指向选择加入公务员考试队伍的个体，这样做恐怕不合适。一个人选择走什么样的职业道路是个人自由。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从自身能力与潜力判断的确适合当公务员，那么选择公务员职业是其个体发展的合理选择。这无可厚非。只有从社会发展与国家建设角度看，对此感到担忧并进行批评指责是可以理解的。倘若一个现代国家所拥有的最优秀人才都向政府部门集中，对于社会创新、进步的影响的确是消极的。

可以说，近年来公务员考试日益受到追捧，已不仅仅是单一的个人选择问题，它同制度的设计、社会的价值取向有关。如果回顾改革开放不久的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备受舆论关注的“下海潮”，我们就会看到，在那个时代，许多公务员希望走上创业道路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是在那个时代，很多大学毕业生也不愿做公务员，而选择去企业或直接自己创业。这说明就在十多年前，中国社会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与当公务员相比，自己经商或进入企业、从事其他职业道路可以获得更大的人生价值。

因此，如今大学毕业生的选择说明一个事实，即他们认为公务员职业对个人来说是条好路子。好在哪里？普遍的看法是认为工作稳定，薪资社会福利有保障，且超过社会平均水平。与之相比，步入社会创业成功的成本越来越大，而风险却日益增加，人们有理由从经济角度考虑，作出“经济的”选择。

从“下海潮”到“国考热”的演变来看，要改变现状，批评青年人贪图安逸不会有积极效果，还得从制度设计与社会价值取向入手进行改变。对于政府而言，在近期最值得入手去做的，应该是制定政策鼓励创新与创业，应从法律、法规这些社会基本制度设计出发，降低创新与创业的成本。比如，我国虽然已对注册公司在注册资金等方面大大降低门槛，但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各种障碍依旧存在，许多大学毕业生有创业的志向与点子，却往往因各种“玻璃门”而放弃创业的道路。同时，行政机关进行制度设计不能站在本位主义，将公务员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应充分考虑社会分配，实现社会公平。

简言之，只有向社会提供多种公平发展机会，破除官本位主义，激发人们创新的激情，才能使“国考热”降温。（2013 年 11 月 25 日《环球时报》何辉）

◆纵 横

“人民公仆”一词从百年前走来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进行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斗争，也留下了许多令人扼腕的故事。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制度、颁布《临时约法》等，人们说过很多；为了取得辛亥革命的成功，许多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勇于牺牲，如秋瑾、林觉民、方声洞等，人们也记得很多。有一件事，人们却很少谈到、很少记得，就是辛亥革命中孙中山提出了人民公仆观念。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自称人民公仆，从而确认以人民为本位。这对于中国阶级社会以来的官场政治，是一大革命。1911 年 12 月 29 日，孙中山为感谢各省代表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在致各省都督电中称“今日代表选举，乃认文为公仆”。把大总统等同于人民的公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孙中山曾以大总统名义发布通令，要求所有政府官员“皆系为民服务，官规具在，莫不负应尽之责任，而无特别之利益”。他还在《建国方略》中说过：“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有一位年逾 80 岁的盐商来南京，想一睹孙中山的风采。孙中山接待了这位老者，并对他说：“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老者问：“总统离职以后呢？”孙中山答道：“总统离职以后，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一样。”孙中山的回答，使这位老者感到他见到了民主的风采。孙中山以总统之尊接待一位普通盐商，体现了一种伟大的公仆精神。这也是孙中山、辛亥革命留给后人的宝贵政治和精神遗产。孙中山自己从政更是以身作则、廉洁自持，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形象。

在封建社会，当官做老爷是社会生活的常态，官老爷高高在上，老百姓匍匐在社会的底层。皇帝以下的官员，县老爷是最低级别的行政官员，但也是父母官，县里的老百姓都是其子民。县老爷又是所谓牧民之官。何谓牧民？就是把老百姓当作牲口来放牧。老百姓见了县老爷就要磕头，自称草民。下级见了上级也要磕头，所有官员见了皇帝都要匍匐称臣。2000 多年来，这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辛亥革命把这个老规矩革掉了。孙中山为了落实人民公仆观念，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布命令，废除老爷称呼，废除磕头礼节；强调人民一律平等，人民是主人，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这种转变与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制度是同等重要的，同样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同样具有极大的纪念意义。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带来政治生活、政治制度的变革。令人扼腕的是，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只做了 3 个月。袁世凯上台后，人民公仆之说不再被人提起，做官依旧，当老爷依旧，人民依然处在社会的底层。

官员是人民公仆，在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变为了现实。中国共产党人来自人民，共产党的官是为人民服务的。1944 年 9 月，毛泽东在追悼中央警卫团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会上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篇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鲜明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一贯强调各级党政干部都是人民公仆、是人民勤务员，执政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过，今天仍有个别党政干部以官老爷自居，不以人民为本位，不在为人民服务上下功夫，为政不廉，贪污腐败，不仅玷污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信念，也与孙中山百年前就提出的人民公仆观念格格不入。

毛泽东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回顾百年中国历程，领导干部应始终牢记“人民公仆”4 个字。（2013 年 12 月 1 日《人民日报》张海鹏）

◆文 坛

官帽椅的尊严

我去美国西雅图时，被朋友安排在一对美国夫妇家住，他们家很大，两座独立的小楼，一座主人住，另一座客人住。我们到达时天色已晚，主人都休息了，我们几个人悄悄进了屋，分头进了房间。进屋时我一直纳闷，美国人为何不锁屋门。

第二天一早才看见主人，聊天时得知男主人是法学专家，女主人是艺术家，所以家中布置得极富艺术气息。主人家有好几把古老的椅子，凭我有限的知识，知道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样式，一打听才知道其中有的是美国造的仿品。这些椅子都很舒适，人坐在上面放松得很，于是我就想起中国古代的官帽椅，一个个都让人正襟危坐。中国人讲究坐姿，坐如钟，站如松。低矮的西式椅子在中国古人看来，人在上面瘫坐一团，坐之不雅，不成体统。

中国古人不是不喜欢舒服，而是不放弃尊严。舒适与尊严，哪个更为重要，哪个符合礼教，这是古人思考的问题。在精神层面上，俯视的快感超越仰视，皇帝坐在金銮宝座上，放弃舒适，保持尊严，实际上是在享受精神的愉悦。

即便乡村家具，也在默默地教育国人，怎样处世，怎样光宗耀祖。一把官帽椅，把宋代以来文人对生活的理解与态度都融进结构与造型，准确地反映了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心态。删繁就简的高尚审美，使一把貌不惊人的椅子，传递着复杂而深厚的文化信息。这种优秀的椅具，小则反映一个乡绅的精神追求，大则诠释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缘由。

今人的收藏，往往会忽视这些崇高的精神含义，而更多注重前人留下的物质财富，在我看来，收藏的悲哀正在于此。（人民文学出版社《马未都说》马未都）

◆史海钩沉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

在著名的 1992 年南方谈话之前，邓小平还有一次精彩而重要的“北方谈话”，甚至被称作邓小平理论的开篇之作。

首提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

1977 年 7 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议。而邓小平“北方谈话”的一个重要背景，则是 1978 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当时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一个强大的阻力，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仍固执己见，反对这场讨论。为进一步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形成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中国政局向前发展，1978 年，邓小平出访朝鲜回国后没直接返回北京，而是于 9 月 13 日至 20 日视察了东北三省以及唐山和天津等地，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

在谈话中，邓小平多次明确谈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邓小平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次战役”不能永远搞下去，基本问题解决就叫彻底解决，要有个底，基本上清理“三种人”，批判了“四人帮”的罪行，这样就行了，要赶快回到经济建设上来。有些单位搞得差不多就可以结束，转入正常工作。从已有的材料看，粉碎“四人帮”后，明确提出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北方谈话”在党内属于首次，具有重要的思想指导意义。

论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老企业改造、农业现代化和发展第三产业等问题，也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改革开放问题。难能可贵的是，“北方谈话”还论及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 月 14 日至 15 日，邓小平在哈尔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工作汇报时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邓小平通过对当时政治体制的批评，实际上提出了打破苏联政治体制模式的改革任务。邓小平还初步形成了指导新时期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的基本思路，即着眼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逐步改革政治体制。

9 月 20 日，邓小平在天津对自己的“北方谈话”进行了一次总结。他对天津市委的领导说：我走了几个地方，一再讲就是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从实际出发。过去不敢进“禁区”，谁要独立思考，就好像是同毛主席对着干。实际上毛主席是真正讲实事求是的。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鼓励懒汉，不独立思考。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管理人员好的也应该待遇高一点，鼓励大家想办法。讲物质刺激，实际上就是要刺激。

华国锋看重邓小平谈话

邓小平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被华国锋接受了。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在北京为华国锋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稿。华国锋告诉李鑫，不要再强调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了，现在要强调经济建设。李鑫问：“第三战役不是政治局决定的吗？”华国锋拿出一份电报说：“小平同志在东北讲了要工作重点转移，政治局讨论过，我们都同意。”有评论称，邓小平在东北的谈话，华国锋这样看重，并遵照邓小平的谈话转变了全党工作重心，应该是邓小平居于主导地位的标志。

回北京后，邓小平继续阐述要进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主张。10 月 3 日，他找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请他们帮助修改自己代表中共中央在工会九大的致辞。其中谈到：现在到了这么个时候，“四人帮”当然要批，但不能老是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现在有些事将要考核我们自己的干部，批了“四人帮”还搞不好，总得整一下自己吧，总得问一问领导人、领导班子是不是可以吧。他在工会九大的致辞中说：“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地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

“北方谈话”提法的产生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为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刮起一缕春风。在当时“两个凡是”错误思想没有纠正的情况下，邓小平这样的谈话很难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甚至不能不遇到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以各种形式的反对和封锁。在相当长的时间，并没有“北方谈话”的说法。

1997 年全国上下掀起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新高潮。辽宁省在缅怀邓小平关怀辽宁过程中，有人偶然发现：邓小平 1978 年 9 月来东北的一系列重要谈话，同 1992 年南方谈话有着惊人相似之处，完全应当称作“北方谈话”。1998 年，一篇《论邓小平二十年前“北方谈话”的伟大意义》论文受到各界肯定，后公开发表。至此，邓小平的“北方谈话”的提法逐渐形成共识。（2013 年 11 月 20 日《福州晚报》）

◆热 词

“绕道入编”

湖南省江永县政府日前证实，近期网上举报的该县一些领导干部子女在本地和异地调动中存在违规行为的问题属实，决定对 7 名未经招聘程序违规进入事业单位的职工予以清退。此前网上举报，江永县多名县级领导干部为子女伪造在外地工作的档案，之后将其调动回江永县行政或事业单位工作，以规避本应该参加的统一招考。

此“创新”之举被网友调侃为“绕道入编”。这些人之所以能成功绕道入编，关键在于他们是领导子女亲属，那么推动绕道的领导干部又岂能毫发无损呢？如果不能让伤害公平正义的所有责任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一些人抱着侥幸心理继续玩弄权力，更是从深层次伤害了用人选人的程序权威和法治原则。（2013 年 11 月 18 日《包头日报》叶祝颐）

全城寻“耳”

近日，宁夏银川一位 4 岁女孩，丢了耳蜗体外处理器。如果找不到这价值 28 万的“耳朵”，不仅一个务工者家庭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小女孩也可能要再受开颅手术之苦。于是，“找‘耳朵’”的帖子和海报，遍布银川的贴吧论坛和大街小巷，在网民、市民、媒体、政府部门官微 114 小时的齐力寻找下，“全城找耳”的故事画上圆满结局。

又是一个温暖人心的“全城动员”故事，近年来类似故事越来越多，郑州“全城吃面”，乌鲁木齐“全城买鹅”……一个市民陷入困境，往往会激发全城市民的爱心行动。虽说最值得感谢的，是人人心中长存的恻隐之心，但网络的牵引、发酵作用，也颇堪寻味。（2013 年 11 月 19 日《新京报》喻辛）

纪委权力优化

纪委反腐权力将实现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称，推动纪检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决定》从源头上开出了药方，是对反腐败体制机制的一种创新，同时也提供了更好的制度保障。此次纪委反腐权力的优化，最终将使纪委发现腐败分子的能力得到提升，这也正是群众所期待的。（2013 年 11 月 21 日《京华时报》凌霄云）

抓大不放小

中央纪委 11 月 21 日下发《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等年货节礼。

很多不正之风，往往寄生于细微行为之上。从禁公款送月饼送节礼，到禁公款购买贺卡，再到禁公款送年货节礼，体现的正是抓大不放小、务虚更务实的态度。反“四风”，需要发扬的是钉钉子精神，一锤一锤敲下去，一项一项改过来，让不正之风一点一滴地改变。（2013 年 11 月 22 日《人民日报》 快评）

“电视晒房”

近日陕西省高陵县电视台陆续播出《向人民述廉》节目，该县选出 19 位官员通过电视画面，向全县 30 万群众，公开介绍自己的住房、配偶及子女基本情况。“电视晒房”，被舆论普遍看作是官员财产公开的新探索。如一位官员所说：“只要看到的人都能够监督，谁还敢说瞎话？”

对于一些地方的改革新举措，最值得担忧的不是开始的不完美，而是能否坚持长久。近年来，类似的局部试点已见得不少，然而在一鸣惊人之后，又偃旗息鼓，除了试点本身是新闻外，并未见对哪位官员有什么实质影响，也未看到更进一步推广的可能。所以，如何防止“电视晒房”等基层探索昙花一现，还有赖更高层级的制度发力。（2013 年 11 月 22 日《新京报》敬一山）

“天价解读”

8800 元上一天课、6800 元听两天讲座。近日，市场上出现了一批“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的“高级研修班”，他们大多以“权威专家解读会议精神”“精确把握政策走向”为宣传重点，面向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招揽学员。

三中全会的政策红利令人期待，奢侈的“讲座”，附着了极浓的功利色彩，借解读全会搞商业性牟利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涉嫌公务性消费，就与当下崇尚节俭、正风肃纪的大气候格格不入。公款“听讲”，是公款奢华消费的一个变种。（2013 年 11 月 25 日《羊城晚报》 范子军）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政编码：100091 社长兼总编辑：谢春涛 常务副总编辑：钟国兴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 180 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 0301 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